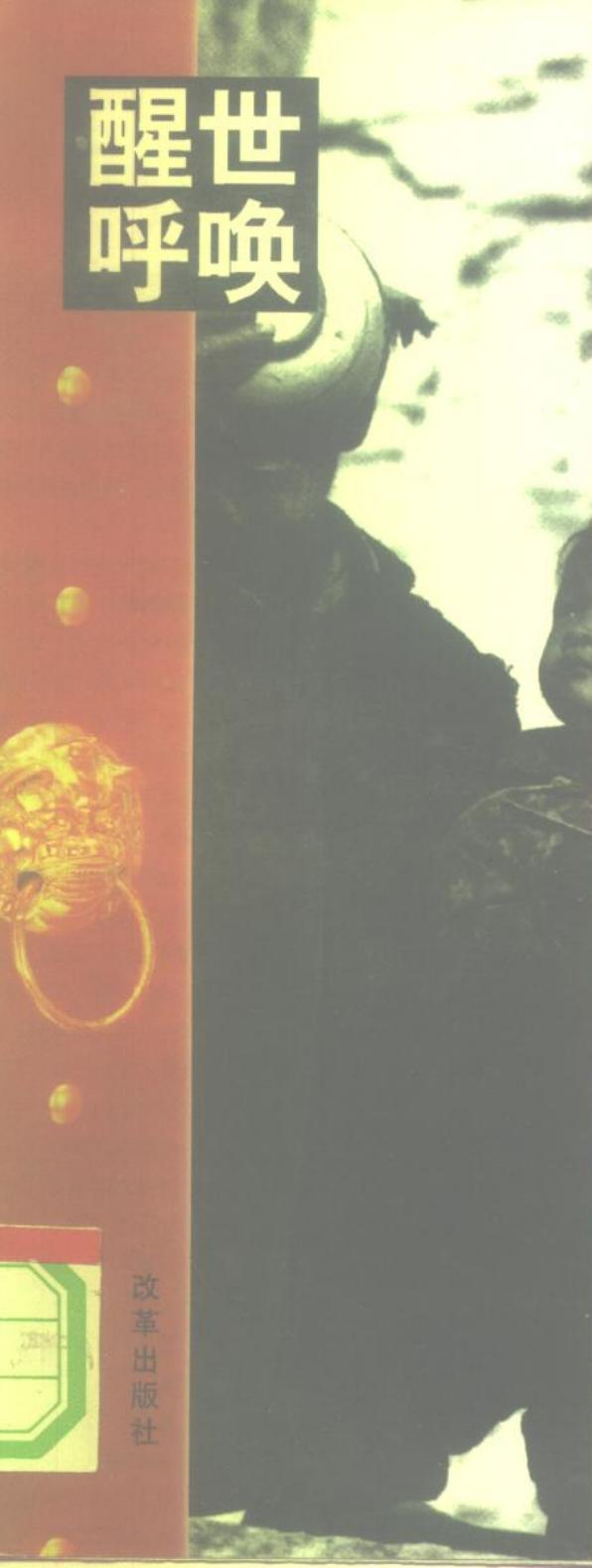


醒世
呼喚



饥饿

会重新叩响中国的大门吗

李希光
聂晓阳

改革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3 6952 5

“醒世呼唤”系列之一

饥饿会重新叩响中国的大门吗?

主编：李希光 聂晓阳

策划：冯 涛

编委：王志勋 程茂吉

王如渊 刘传祥



改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醒世呼唤:饥饿会重新叩响中国的大门吗? /李希光,聂晓阳主编.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 8

ISBN 7-80072-886-2

I . 醒… II . ①李… ②聂… III . 粮食-问题-研究-中国
IV . F326. 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4726 号

《醒世呼唤》系列之一 饥饿会重新叩响中国的大门吗?

主 编:李希光 聂晓阳

编 委:王志勋 程茂吉

王如渊 刘传祥

责任编辑:郑保华 监督印制:冯 哲

改革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 23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地质矿产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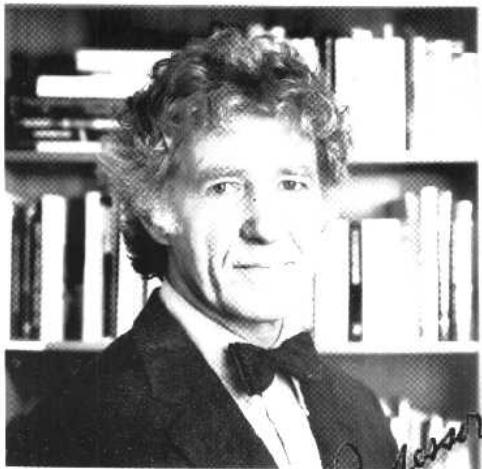
1996 年 8 月第 1 版,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231 千字

印数:00,001—20,000 册

ISBN 7-80072-886-2/F. 326

定价:15. 60 元



for Professor Li Xiguang
whose concern
I share - whose friendship
I value
Lester R. Brown
September 21, 1985

李希光先生： 我分担你的忧虑
我珍视你的友谊

Lester R. Brown

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
美国前农业部部长顾问
布朗博士给本书主编的题词

60090/6

代序

1

代序

李希光

最初知道布朗的名字还是将近两年前的事。

1994年9月的一天下午，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研究员胡鞍钢博士给新华社对外部中央新闻采编室来电话说：“希光，我这里有一篇驳斥布朗的文章，请你看看能否对外编发一下。”

“布朗是谁？为什么要批判他？请你把全部资料，包括布朗自己发表的东西一道给我传过来，我看一下再说。”我回答。

半个小时后，对外部发稿中心的干事小谭交给我厚厚一叠刚刚收到的传真，里面除了胡鞍钢本人的文章外，还有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连载的一篇长文：《谁将养活中国？》。这篇文章认为，如果中国走日本、韩国或台湾高速发展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将要失去大量农田，粮食将无法自给。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布朗这篇耸人听闻的文章同时被《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美联社全文刊登或摘发。我根据胡鞍钢的文章编发了一条专家访谈，请对外部主任王宗引审定签发。

布朗这篇文章的出笼，使他的“大名”作为反驳的对象不断出现在中国的新闻媒介上。

1995年春，针对布朗关于中国粮食问题的悲观言论，新华社对外部又组织记者采访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和农业部部长刘江等，发表了一组中国能够自主解决粮食问题的稿件，在海外引起很大反响。

读了新华社对外部的这些报道后，布朗说：“没想到中国人对粮食进口问题这么敏感，这可能是因为今天的中国领导人都经历过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的国民心态至今还有那次大饥荒的阴影。大量依靠国外进口粮食无论在政治上或是心理上都是无法接受的。”

“但是，有意思的是，从此之后，中国领导人与我好像开展了一场非直接的‘对话’。路透社报道说，1995年2月和3月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当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特别强调了农业问题。”布朗说。

1995年夏，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又邀请布朗到北京，就中国的粮食问题组织了一批中国专家学者与他开了两天的辩论会。新华社对外部记者江国成和几位西方驻京记者到会采访了布朗。江国成发的稿子题目是《布朗承认中国粮食缺口比他预料的要小》。

1995年6月下旬，华盛顿酷热似火。这天，我坐在装有中央空调的《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大楼里，一会儿从电脑里调阅美联社、路透社的消息，一会儿输入一个关键词，从国际互联网中查阅需要的信息，很是悠闲。然而，我的编辑，国内部副主任苏珊博士见我如此悠哉，心里过意不去，便顺手把她刚收到的一份传真通知交给我，要我参加第二天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并说，明天下午5时截稿，后天见报。

第二天中午12时，我按通知上的地址找到了世界观察研究所所在的写字楼，电梯门前的墙上钉有一块指路牌，从上面可以看出，大概有十几家机构在这个写字楼里办公。坐电梯到8层，往左手一拐，看到一扇玻璃门上写着“World Watch Institute”

(世界观察研究所)。推开玻璃门是一个大厅,大厅四周陈列着这个研究所历年来的各种文字出版物,大厅中间坐着一位接待小姐,她请我签一下到,然后指示我走进隔壁的一间小会议室。会议室里已经坐着美联社、路透社、塔斯社、《时代周刊》、《金融时报》等新闻单位的十几名记者。他们正一边吃着午餐,一边看研究所提供的又一篇“醒世报告”——《世界正面临异国生物入侵的严重危害》。

布朗惊愕地看到《华盛顿邮报》派了一个中国人来采访,便走到我跟前,与我热情地握手。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没指望《华盛顿邮报》会采用这位中国记者写的稿件。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刊登了我采写的这篇环境报道。早上,我一到办公室就接到布朗的电话:“李先生,我看到了今天早上的报纸,你的稿子写得很精彩,想不到中国人能写这么好的英语。”

“不足为奇,新华社有许多记者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稿。”我说。

“那么,你不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我是《华盛顿邮报》邀请来的访问记者,在这里工作6个月。”

“那太好了,今后几个月,我的研究所所有的新闻发布会都请你参加。”

布朗从北京回来两个月后的一个早上打电话给我的办公室,请我参加9月初他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他从北京回来后写的一本新书:《谁将养活中国?》。我问他,怎么这么快就写完了一本书,他说:“这本书是我口述、由我的秘书直接录入

电脑,不到一个月就写完了。”

他在电话中问我能否在《华盛顿邮报》给他发一条消息。我说,您先把发布会书面通知和新书样本尽快派人送来,我要拿这两样东西请示我的编辑苏珊博士,如果她同意,我就去采访报道。

当天下午,我从楼下咖啡厅吃完午饭,一回到五层的编辑部,就发现摆在我桌子上的写有“急件”的布朗派人送来的通知和样书。苏珊翻了翻书说:“你要愿意写就去吧,但我听说这个研究所经常搞一些耸人听闻甚至偏激的东西,你报道时要注意平衡。”

这天下午新闻发布会一结束,我就赶回报社写稿,晚上5时截稿前,我把下面这篇稿件送到了苏珊手中:

中国人肉吃多了,美国人就得勒紧裤腰带吗?

——美国环保主义者称,中国人口激增将会造成世界性的粮价上涨

本报讯(《华盛顿邮报》记者李希光)最近一个去中国湖南乡村采访的记者问一个姓严的老汉生活是否改善,老汉回答:“日子过得好多了。现在我家两天就可吃一顿肉,而10年前,我们只是到了过年时才杀一口猪,吃上肉。”

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前,严老汉的家代表着一个典型的中国农家,全家养一口猪,这口猪既是收容饭桌上残羹剩饭的垃圾桶,又是生产农田所需肥料的造肥厂。农民们只有在儿子结婚或阴历新年时,才肯宰杀一口猪。

经过17年的农村经济改革,严老汉和成千上万其他中国农

民一样，经常可以在餐桌上见到肉了。但是，中国农民饭碗里多了一点肉，令华盛顿一批环保主义者感到惶恐，他们认为，中国人对鸡、鱼、肉、蛋，甚至牛奶、啤酒和冰激淋的胃口越来越大，将会把世界市场上出售的粮食全部吃光。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今天在此间发表一份长达 141 页的报告《谁将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布朗写道：“中国经济在过去 4 年里惊人地增长 56%，人均收入增加了 50%。随着收入的增加，过去那些温饱都解决不了的人首先是丰富他们的饮食，从以淀粉类食品为主的饭菜，转变为包括鸡鱼肉蛋、牛奶黄油、酸奶甚至冰激淋的多样化菜肴。……”

苏珊看了看我的稿子犹豫了一下：“能不能发这篇稿件，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编鲍博。”15 分钟后，苏珊拿着这篇稿子回到我的桌旁，面带歉意地说：“希光，鲍博不同意刊登这篇稿子。而且鲍博说，以后不准你采写与中国有关的任何稿件。”“为什么？”我问。“鲍博此刻正在办公室等你，跟你解释。”片刻后，苏珊陪我走进鲍博所在的玻璃房子。鲍博客气地请我坐在沙发上，然后说：“李，这篇稿件我们不能刊登，而且以后也不准你采写与中国有关的稿件。”“为什么？”我问。“这是因为你是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记者，你写的关于中国的稿件难保不受中国官方观点的影响。”

在以后的一周里，我与布朗共进了两次中餐和两次晚餐，完成了对这位美国知识界“好事之徒”的单独采访。

布朗关于中国粮食报告中的一些“过激”的形容词，无疑刺痛了自尊心很强的中国知识界、新闻界的专家、学者和记者。为

了使争论双方都能冷静地思考对方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在采访中请布朗所长能平和、正面地谈谈中国面临的问题,并向中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布朗说,首先值得称道的是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尽管美国国会和美国舆论大肆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违反人权,但他认为,中国选择了一条完全正确的人口发展道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有勇气面对未来的30或40年中其迅速增长的人口将给人类的生活质量、水资源、粮食供应和就业等问题带来的冲击,”他说。

“中国从70年代开始实行两个孩子的政策,70年代末全面推行一个孩子的政策。很多国家早就该这么做,而且,我认为中国也做晚了。如果中国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今天的日子会好过得多,”他说。

“中国还要加大力量保护宝贵的农田。近年来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省份,这些省份是中国的双季稻、甚至三季稻的产地,那里的农田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产量最高的农田之一,但就是在这些省份,农田破坏最严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90年以来中国水稻产量下降了8%,”布朗说。

“1994年北京决定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希望它会形成中国工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如果中国真的采取以汽车为中心的交通系统,中国将会由于修建道路、高速公路、停车场失去更多的良田,”布朗说。“美国已经犯了这方面的错误,希望中国不要重复这个错误。”

“中国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围绕汽车转的交通系统,而是一个现代化的轻轨铁路或高速铁路运输系统,”他说。“由于交能落后,中国就像一块没写字的黑板,中国有选择发展最先进的铁路

运输上的大部分需求。如果中国选择得当,她将成为全世界发展运输业的楷模。”

“如果中国在减少人口和保护农田方面做好了,中国将来就不会依赖进口粮食生存,”布朗说。

布朗说,他上述的建议并不是什么新思想,早在 1994 年初,《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邵培德在一篇周光召的专访《充满活力的新中国在与时间赛跑》中,周光召院长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1995 年 10 月的一天,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教授抵达华盛顿访问。我打电话给布朗:“布朗先生,您的书中既然引用了周教授的观点,那么您是否有兴趣与他当面交换一下意见,听听他对您这本新书的看法?”布朗立即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周光召在华盛顿仅停留两天,但第二天上午,他还是挤出时间到世界观察研究所与该所主要研究人员就中国的粮食问题进行了交谈。中午到了,布朗请我们走到杜邦广场附近的宇宙俱乐部一边吃午餐、一边继续交谈。环境设施幽雅华贵的宇宙俱乐部,是美国东部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府高级官员平日聚会的场所。

周光召对布朗在书中提出的关于中国有可能会引发世界性的粮价上涨的“神话”表示怀疑。周光召的随行人员还问布朗:非洲在挨饿、俄国粮食歉收,比中国更需要粮食。为什么你只提出谁将养活中国?而不提出谁将养活非洲?谁将养活俄国?

布朗说,中国的经济是当前世界经济中最有朝气的。过去 4 年中,中国经济每年以 13% 的速度增长,12 亿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增长了 50%。这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中国与非洲不同,中国的粮食进口赤字是工业和经济成功的结果。而非洲,不断增长的粮食赤字是迅速增长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失败

的结果。

中国与俄罗斯相比是另外一回事，自从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粮食进口的需求在过去 4 年中急剧下降，从每年的 1500 万吨下降到 2 万吨。这不是因为俄罗斯的农业生产搞上去了，而是因为经济情况的恶化使人民购买力下跌，迫使人民减少肉、牛奶和鸡蛋的消费。肉奶蛋都是消耗粮食的食品，俄罗斯对粮食的总需求因此而大幅度下跌。

“谈中国的粮食问题，我们应该从全球的大背景看。今天，全球的渔民们已经把海洋的鱼资源捕捞到了极限。与此同时，美国、印度和中国北方的主要产粮区面临严重的干旱，而且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水资源短缺，”布朗说。

周光召对布朗说，中科院在华北地区正在成功地开展新的灌溉系统试验，同时，中国科学家期待着通过改良农作物品种和提高农业技术来增加粮食产量。

布朗回答：“令人担忧的是，利用农业技术增加产量也是有一定限度的，特别是依靠化肥增产已经到了极限。从 1959 年到 1989 年 30 年中，农民使用化肥量一直在不断增长。但是进入 90 年代以来，美国农民的化肥使用量比 80 年代有所减少，这是因为农作物对化肥的反应不再那么灵敏，中国今天在比美国少得多的耕地上使用比美国多一半的化肥，我预计化肥在中国的使用量不久将会减少。”

布朗说，今天世界关注中国的粮食问题完全是历史的巧合，这是因为过去 5 年中全球的粮食产量和捕捞量没有任何增长。如果中国对粮食的大幅度需求发生在 15 年前，国际舆论是不会这样关注的。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印度，国际社会也不会如此关

心,因为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远不如中国。

“中国对粮食的需求和进口对各国领导人来讲应该是一种‘醒世呼唤’,它提醒各国领导人,必须选择一条人口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道路。人类必须重新思考他们的饮食结构,比如,在全球性粮食产量无增长的情况下,美国人是否应该继续他们那种高消费生活方式?地球上的任何一对夫妻能否找到合理的理由生两个以上的孩子?能否继续用人权或道义的口号为多生孩子辩护?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否应该追求美国那种高消费的生活?美国人是否应该因为手中有雄厚的购买力而继续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华盛顿的决策者和舆论界应该重新考虑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他说。

“人类最终能否解决所面临的粮食问题?”我问。

“只要人类有决心,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分配财富,关注我们的经济环境支持系统——土壤、水资源等。”

“美国政府和舆论界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控制人口增长和一个孩子政策的重要性。我感觉到,大部分美国人根本不了解人口给中国的资源带来的巨大压力。其次,美国应该把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转让给中国。但是,我认为,总的来看,中国农业的发展水平不比美国低很多,中国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退化和北方的水资源短缺。当务之急应该是中美两国的科学家和农业专家携起手来,寻找一种充分利用水资源的科学的灌溉技术,”布朗说。

1995年9月12日凌晨1:30,一个由华盛顿高层农业专家、气象专家和遥感卫星专家组成的小组,走进美国农业部南楼五

层的走廊，紧跟着他们的一个武装警卫，把身后那扇沉重的钢门紧紧地关上并牢牢地锁上。会议室所有的窗户都被窗帘严严遮住了，通往五层的楼梯和电梯也锁上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这个小组一直趴在一份他们带来的关于粮食作物产量和市场供给情况的资料上，这些资料是根据100多个农业国家的报告和卫星观测报告及气象分析综合而成。

凌晨5时，这个小组来到另一间会议室的一张桌子前，再一次审定他们的报告。

黎明时分，十几位西方通讯社的记者经过安全检查后陆续来到南楼。7时整，他们被允许进入上了锁的五层那间警戒森严的房间，在严密的监视下，发给每一位记者一张计算机软盘和一根“上了锁的电话线”。记者们打开电脑，开始阅读这个世界农业观察小组刚刚完成的世界农业报告。8:30，铁门打开了，“禁令”解除，记者通往外界的电话被开通，厚厚的窗帘拉开迎来了满屋的阳光。与此同时，这份农业报告也通过国际互联网发往世界各地。

粗看上去，记者们手中拿到的是世界大米、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的库存统计，表明世界库存粮食已跌到过去20年中的最低点。这个情报对做农产品交易的商人来说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它可使他们一夜间暴富或变成穷光蛋。但是，早上8:30，当布朗从电脑里看到这张统计表并把它与全球人口资料联系起来时，他惊讶地发现：留给1996年的世界粮食储存量只够人类吃49天了，这是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一个人口急剧增长的世界，留给下一年的粮食储存量已经成为衡量我们这个小行星能否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的关键性

指标，”布朗说。

布朗根据这份报告写下了一篇文章：《面对粮食短缺》。在这篇文章中布朗声称，随着世界人口剧增和粮食储备的下降，人类最大的挑战将是如何渡过每年青黄不接的季节。

像他的其他“醒世报告”一样，布朗的这篇文章在1995年12月发表后立即在国际舆论界造成很大轰动。虽然美联社在摘要这篇文章时引用了与布朗持不同意见的人士的话加以评论，认为布朗的文章有些“言过其实”，但布朗擅长从繁杂枯燥的数字中发现敏感信息的新闻嗅觉，给我这位中国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布朗为我饯行的那天晚上，我在饭桌上问他：“我明天就要离开华盛顿了，请您给我讲心里话，您关于粮食问题的预测是否言过其实？”

布朗说：“如果您不在意的话，请吃完饭后到我家坐一会儿，我再回答这个问题。”

离开酒吧，布朗的女友开着一辆红色的轿车送我们到布朗的公寓。布朗在这座公寓的六层有一个两室一厅的寓所，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对面漆黑的华盛顿动物园和仍然亮着灯的中国大使馆大楼。

布朗的住房按美国的标准来讲算是“寒酸”的了，厕所和厨房都很狭小，卧室的布置也很俭朴，只摆了一张双人床。只有客厅与外面封闭的阳台打通，显得宽敞、舒适。客厅旁是布朗的书房，书房很小，所以布朗的书架从书房一直摆到阳台上。他亲自给自己所有的书都编了号，我从书架上取下的每一本书布朗都按编号放回原处。

布朗有两个特殊的书架,一个存放着作者签名送给他的书,另一个收藏的是他自己的著作。布朗从书架上取下一本1963年出版的旧书,书名是《人类、土地和粮食:展望世界粮食需求》。这是他的第一本书,当时他29岁。迄今他已出版了25本环保方面的书籍。

布朗的老家是新泽西州,他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种过土豆。读大学时,他曾获得过美国总统亲自颁发的“天才奖”,并先后在马里兰大学、哈佛大学、比萨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获得过学位。大学毕业后,布朗曾在美国农业部任研究员和部长顾问。离开农业部后,他以自己的名义创办了世界观察研究所。这个拥有30名固定研究人员的私人研究所,每年从各种基金会和国际组织获得研究经费400万美元,此外,每年销售研究所发表的十几种“醒世报告”(其中包括定期的月刊《世界观察》、年刊《世界状况》和《生死攸关的征兆》等)还能赚400万美元。由于布朗对国际环境运动的贡献,他曾获得1989年联合国环境奖和1995年“蓝星球奖”。

布朗和他的研究所每年的收入可观,仅1995年“蓝星球奖”一项就获奖金50万美元,但他仍然坚持俭朴的生活方式,每两周雇一个女佣来公寓打扫一次卫生。布朗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做饭,除非是为了约会或与朋友谈事方便,才到餐厅吃饭,“我喜欢吃肉、青菜和豆腐,”他说。“我把研究所的各项收入和个人的奖金全部用在科学的研究上了。”

布朗的女儿和前妻至今还在美国西部洛基山务农。前妻已经嫁人,女儿也已成家立业,在科罗拉多州以养马和奶牛为生。但62岁的布朗不想再结婚。“虽然我周围有不少女朋友,但我喜欢一个人生活,这样过得更自在。”

“那你这个圣诞节怎么过？”我问。

“圣诞我不会寂寞的，和往年一样，今年我还是去农场，与我的女儿、前妻和她们的丈夫共同过圣诞节。我是一个农民，我喜欢在农村过节。”

离开他家前，布朗从书架上取下最近两年的新作：《最后的绿州》、《多少才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和《生死攸关的征兆》，并签上名送给我，说：“你回国后，有空看看我的这几本书，然后再判断我的醒世呼唤是否言过其实。”

我至今还没抽出空来读他的这几本书，但我希望，这里记述的一个美国“农民”与他制造的“醒世新闻”的故事会给大家一点启示。